在時間與想像空間之間擺盪的敘事:
系統理論取徑的重構嘗試

魯貴顯*

摘要

敘事的建構性質已為一般所接受，其貢獻在於製造事件的先後序列，使世界變得可理解。但另一方面敘事又仰賴著實際發生過的事件，或是仰賴於人的生活經驗與意義方式。時間因此淪為散亂世界中的順序鏈製造者而已。但是，敘事本身是否也在時間中實現為敘事？這樣的反身思考就將焦點轉移到敘事的當下性（Gegenwart）。

敘事，作為一個社會現實，來自於說與聽，或書寫與閱讀的交錯。敘事的每一瞬間，理解處在某種程度上未規定的狀態，因而需要事件的起滅，同時，來回穿梭於行動者所假定的真實與虛構、自我與他者、過去與未來的邊界時，也編織出一個可供游移的空間，彷彿可以支配著時間的模態與安排。

以 G. Spencer Brown 的形式理論來看，當系統自我觀察時，其本身運作狀態是無法被明確規定，它具有兩個可行的解決選項，要實現此二選項，就只能依靠時間，即，不斷地擺盪於兩選項之間。而這種來回擺盪，可以被空間化，成為一個想像的點，它同時地存在於兩個選項之間。本文將以此理論為基礎探討，由觀察者所造成的高度複雜性，使得敘事一方面使用時間（事件的起滅），允許各種序列的安排，另一方面則進行空間化，促成一個同時跨越真實與想像、說者與聽者的想像式空間，在其中人們組合出各種時間性質，接受事物的未規定性等等。

*魯貴顯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聯絡方式為:klu@mac.com。

1. 前言

社會學的研究往往宣稱直接面對著對象，它們可能是事件、活動、團體或個人，或甚至宣稱，研究者曾經就是參與其中的體驗者與觀察者。研究者的體驗（至少某種程度上）被當作真實再現的保證。一般來說，反省這類的體驗，是多餘的。反省至多只是為了使再現更準確而已。訪談記錄、影像、觀察報告等等所謂的原始資料，都被視為來自對象。可是，稍加追問研究者的感知，以及對於感知的書寫如何能保證正確時，這些體驗與資料是值得深思的。

以見證（testimony）來說，一般認為見證是再現親眼所見的事件。研究者本人與他所採集的資料也是基於這樣的想法。但是，Rigoberta Menchú 對瓜地馬拉的暴行的見證說詞，或是 Primo Levi 對 Auschwitz 集中營的經歷見證，卻引發人們追問，見證一事或者對事件的描述是否可能？社會為何需要見證？（Colás, 1996; Quattrone, 2006）[1]在這類事件中，遭受苦難者的感受早已逝去，即便當事人現身說法，也只能透過語言影像的方式描述。事件當事人的當下感受變成了見證所無法觸及的對象。見證因此易受到質疑，不再等同於再現事件本身。見證弔詭地是面對著無法描述的對象，這同時也引發更強烈對見證或敘事的需求，想填補始終缺漏的部份。於是，一次次的見證都是屬於見證者、敘事者，而非受難者。後者此時必須沉默，是被排除的一方，不再能說話，如此才能使見證者的身份得以可能。

沉默或被排除的問題也同樣存在於敘事之中，即，敘事並非再現過去的事件，也不是再現當時觀察者的體驗，即便當時有所感受的行動者與事後的敘事者是同一人。研究者有可能讓他者在研究中發聲嗎？這可以是個倫理問題，但也可以是個理論問題，讓社會學反省經驗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1]參閱 Santiago Colás, What´s Wrong with Representation? Testimonio and Democratic Culture, in:Georg M. Gugelberger (ed.):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161-171；Paolo Quattrone, Case Study as lacuna: The Presence of an Abse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estimony, in: Organization.2006; 13: 143-157。

與限制。

敘事毋須被視為事件的客觀反映，但也不必然走向反省他者一途。在其它的研究領域裡，像是人類學、文學與史學，敘事被視為與時間相關。社會學也逐漸關注兩者之間的關聯（柯志明，2005）[2]。不過，這主要是因為敘述者與閱讀者認識到人物角色、行動、情節的變化，簡單地說，是以變動連續體（Wandlungskontinuum）定義時間，就像是從刻度 A 到刻度 B 的變化得知時間的存在與消失（Elias, 1988）[3]。敘事被固定在特定的事件序列，並按照所謂的合理情節，或日常的意義結構被組織。這麼一來，引進時間角度只是強調事件某種程度上有銜接的自由。至於敘事本身如何使時間得以可能，或者徹底地說，敘事如何以時間形式運作著，這樣的問題就被排除在外（Santos, 2001）[4]。

本文無法完整地處理這個問題，僅嘗試在理論上提供幾個思考的路徑。第一章將試圖指出社會學的敘事工作，或者對敘事的理解，有哪些可能的預設，以及可能將之取代的一些理論進路；接著，可以將敘事視為溝通形式，藉著 Spencer Brown 的形式理論的兩個原則，擺盪與記憶，可以指出，敘事如何製造出空間化的銜接序列，且能製造出書寫與閱讀的自由。

2. 社會學如何觀察敘事？行動、脈絡與空間化結構

就社會學來看，敘事有兩個謎，一是，敘事中的行動為何能被指認為一個單元？二是，對行動的限制性框架為何能如此輕易地被設定？探討這兩個基本問題將可以引出時間的必要性。

---

[2] 例如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學》，10，頁 149-170。

[3] 參閱 Norbert Elias, Ü ber die Zeit. Arbeit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II, F.a.M. 1988, S.6ff.

[4] 徹底來說，時間就在行動或事件本身，是根本無從觀察的對象。這樣一個徹底的思考，也被排除在外。關於時間最終作為無可體驗，無可達及的狀態，可參閱 MyrianSepúlveda Santos, Memory and Narrative in Social The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Jacques Derrida and Walter Benjamin, in: Time & Society, Vol. 10 (2/3), 2001, pp.163-189。

行動的同一性來自溝通的自我化約。敘事一般說來是依靠著行動的順序，但一些文本比較卻指出，行動順序與銜接並不一定是必要的構成要素（Goody, 1991）[5]。不過，行動本身還是被視為最基本的元素。我們可能接受行動的銜接是偶連的，但是很難不將行動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事實。

Parsons 質疑這個基本事實，認為它須依靠某些構成條件，於是將行動這個單元拆解成幾個更小的組成要素，例如意圖、目的、有助於行動的資源或對行動的限制條件（Parsons, 1968／張明德、夏翼男與彭剛譯，2003）[6]。這表示，不論是日常知識或是社會學，都必須預先建構出行動者的意圖、限制與資源，才能出現「行動」這個實在。但，社會性質的基本事實需要如此多的條件限制嗎？

什麼稱得上意圖、限制、資源？這些概念或是被視為既予的社會實在，都可被往下無限追問，進而最後被發現，它們總是模糊多義的，作為何物取決於觀察者所選擇的方向，就像查字典裡的字義，每個字的解釋是由另外一群字組織起來的結果。若時間足夠，每個字的解釋最終經過或長或短的指涉過程而回到自身。這也就是 G.Bateson（1988／章明儀譯，2003）封閉性遞迴[7]。獨特的意義網絡才能使原本看來是個別偶然的意義選擇，變成必然如此的事實。

據此，所謂的社會實在是持續選擇的結果。選擇總是在「實現的 / 可能的」這組差異裡才得進行。黑板上的白點，正因兩者的差異才使後者得以實現，人們因為只注意白點，遺忘原本的差異。或者，就如 Shannon 與 Weaver 所說的，溝通當下實現的訊息是從一些可能的訊息中被選出的結果

---

[5]參閱 Goody, Jack, The Time of Telling and the Telling of Time in Written and Oral Cultures, in John Bender / David E. Wellbery, eds.,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Stanford, California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77-96。

[6]參閱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南京，2003。譯林出版社，第二章。

[7]參閱葛雷格里.貝特森，《心智與自然. 統合生命與非生命世界的心置生態學》，台北，2003 年，商周出版社，第四章。

（Shannon& Weaver, 1949）[8]。據此道理，Luhmann 的社會學理論是建立在差異思維之上，亦即區分。有了區分，才得以選擇其中一邊，進而遺忘區分的存在。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以區分、選擇、差異這些想法重構社會的實在？簡單地說，ego 與 alter 兩者，其中一方若能區別出告知與訊息，並進一步認定自己有所理解時，溝通便完成，社會實在也就出現。這裡，溝通就是選擇出三個區分，並加以綜合。這樣的區分是人或行動者的基本能力嗎？系統理論毋寧將區分視為有機體生物的最基本能力，溝通是兩個尚不以「人」自稱，也不具備語言能力的處理器。就如同一個字或新字在字典中只能由原本的字詞意義加以解釋，溝通也只能經由其它的溝通生產。溝通為了自我生產，必須在演化中創造更多觀察的可能性，更多的語意，更多的媒介。「人」、「行動（者）」、「文化」、「自由」等等概念正是溝通不斷觀察與描述其它諸多溝通之後的沉澱結果。

行動，常被視為既予的社會實在，可以說是溝通這個區別（即「告知/訊息」）的其中一邊，並忽略了此區別的存在。Luhmann 因此將行動視為溝通的自我觀察與描述，是一種自我簡化，使原本處處偶然的三段選擇變成 Parsons 筆下的行動的諸多特性。原本告知必須與訊息區分開來，告知才得以成為告知，但在行動的思維下，告知變成了告知行動（mitteilende Handlung 或 Mitteilungshandlung）。溝通變成是依附著行動者，是他傳達意圖、知識的工具。這也就是我們一般熟悉的溝通概念。這樣的化約所帶來的成效是：溝通，這個剎那間起滅、且無法當下觀察的元素，獲得了**規定**，也就是被編入特定的時間序列之中，與其它同樣被規定了的行動相互銜接（Luhmann, 1984）[9]。就在獲得規定的瞬間，行動者這個建構物也浮現，彷彿他是在溝通之前就已存在著，是溝通的前提條件。這樣一個「行

---

[8] 參閱 C. E. Shannon / W.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49。

[9] 參閱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a.M. 1984, S.228f., 231。

動者」本身也就同時地規定（建構）所有其他的行動者，使得他們仿佛置身同一個處境，同時一起看見同一個行動。如此才造就了行動或事件的本真性與客觀性。在這樣的化約下，行動者當然無法再觀察到溝通作為差異，而只能假設，原本存在著諸多的行動者，他們的行動有其（彷彿獨立於處境之外的）同一性，但可以從各種視角加以詮釋[10]。

行動，這個由溝通自我化約而出現的實在，不只規定了溝通的同一性，也帶來了**可控制的不確定性**。例如，時間面向上，人們回顧過去時已能意識到，歷史往往取決當下的社會條件或觀察者的視角，或者將未來視為風險性的；在社會面向上，人們在爭辯中最後只能將自己的看法當成某一個意見，必須面對著 alter ego 的否定。行動者正好由此證明他與別人都擁有自由選擇的空間，也同時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測的，或者他會寄望未來的開放性、保持與他者之間的差異、將自己看成他者的他者、要求（不）平等的對話，或寄望集體或制度帶來引導效果。

上述觀點有助於澄清，敘事所倚賴的行動事件與行動序列並不是既予的、不是再現已發生的事件，也不是單純來自於說者與聽者對社會的想像。**「行動」本身在行動者面前呈現，或者行動被描述及書寫之時，就已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在這秩序之中，對行動或敘事中的行動進行反省，都只能再回到意圖、目的、人格、知識、已知（或，未知）的行動佈局、同意與歧見、開始與結束等等這些固有值。行動者，包含關於行動的理論，因此無法看見，他們在其所謂的「行動」當下建構了他們自己所看見的世界。現在，如果我們離開這個遞迴圈（或，我們會因此製造更複雜的多層次遞迴圈？），將焦點擺在化約時所排除的其它可能性，尤其是化約這個運作時，新的問題就會浮現：當我們重新考慮被排除的諸可能性時，敘事（作為溝通）就變得愈加不可能，社會如何能使之更為可能呢？

---

[10] 也難怪社會學學者在分析所謂的「處境」時，親自變成當中的行動者之一，既能設想其他行動者的意圖、目的、心理狀態，又能使情境一直保持恆定。而且，研究者似乎既能看到本真的行動或事件，又能看到行動者的詮釋角度。

2.1. 起著排除作用的脈絡

從亞理斯多德的《詩學》中所談的悲劇來看，行動早就已經被思考成一個依靠著韻律的事件[11]。有起點與終點。在這裡所關乎的，反而不是行動者，而是事件的起伏。時間的先後順序安排著行動，使行動得以有意義。但這依然未觸及一個更深的問題：為何總有完整的情節或韻律作為統一？

敘事本身是「**事件**（或發生）/ **敘事**」這組差異的統一，尤其是在書寫的條件下，敘述與閱讀雙方更能假設，存在著一個時間上先於敘事的事件發生。這種所假設的「真實發生」是敘事的基石，同時也跨越了一般所區分的歷史性敘事與虛構性（小說）敘事。因為，即便虛構，也同樣必須假設在真實世界中不曾發生過這些事件，即，人們必須不斷地參照所謂的「真實地發生過的事件」來指出，什麼是未發生的，因此，人們經歷到：未發生一事總是一再地「發生」著，而且是緊跟著真實發生者一併出現；並且，就在虛構故事中，人們同樣經歷著，一幕幕的情節與事件不斷發生與消逝。在虛構中，事件依然真實地發生著。

真實發生一事並不保證敘事必然完整再現，相反地，在敘事這一邊需要更多的偏離，以保證人們可以再度回到真實發生這一邊。而關於此偏離，人們早有了偶連性的經驗，已經認識到，敘事往往是個相當主觀的描述。此時，人們已經從「真實發生者」這一邊跨向另一個差異：**脈絡** / **敘事**。真實發生者已經不再是溝通的焦點，雖然它一直被預設為前提。在脈絡 / 敘事這組差異下，敘事被假設總是在特定脈絡下發生，即，總在事件發生之後，人們在某種特定情境中述說故事，可能是在接受盤問時、情緒尚未平復時、在道德要求下、在科學的訪談中、接受心理學的測試時，或被媒體採訪時。對於行動論者來說，這些脈絡正是決定了敘事內容及敘事方式。

---

[11] 參閱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0 及之後。

敘事雖然是偶連的，但又非偶連，因為它總是發生在一個可被追溯，或可被事後說明的脈絡之中[12]。

我們暫時擱置這些依靠脈絡而來的說明，不必接受這些行動者想像出來的脈絡（當然，我們也同樣也不必接受敘事者自己在故事中為自己的行動或解釋所提出或假設的脈絡），而追問：在敘事時或者觀察敘事時，脈絡這個概念究竟何用？

White（1995）將脈絡看成對行動的約束，起因於行動者所感知的不確定性[13]。脈絡是行動者的建構，而非外在環境的客觀限制，雖然行動者往往將建構物外化成看似客觀的外在條件。行動者正是在不確定性下，迫使自己行動，以約束自己及對方行動的可能選項。因此，脈絡這個溝通，關鍵不在於何種具體的脈絡，而在於脈絡是一種選擇，它限制著接下來的選擇。

我們就由這樣的見解來思考敘事與脈絡的關係。脈絡是觀察者的投射，想將行動銜接固定下來，即，閱讀者已經可以預見不確定性，要應付此不確定性，就必須假設存在著某個統一，它允許可指認的變異（為了帶來驚訝！）。而且，以 White 的話來說，脈絡可以說是一種控制（control），試圖控制著雙方行動，在每個行動中，觀察者都必須透過描述、對話這類的活動而給予可期待的方向，以降低不確定感。

上述的道理會將問題帶往時間面向。故事情節、敘事中出現的諸事件、人物角色的特性等等，並未決定了時間，也未決定敘事的先後順序，反而，

---

[12] 這也是為何 van Fraassen 會說，世界總是經由不同的觀察者連結起多種的事件串。他將世界看成是一個有待人們規定的對象。當然，他仍保留著事件串連的開放性，將之視為重點，而不再深入探討：事件的連結是如何可能的？參閱 Bastiaan C. vanFraassen, Time in Physical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John Bender / David E. Wellbery, eds.: 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Stanford, California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9-37。

[13] 參閱 H. C. White, Social Networks Can Resolve Actor Paradoxes in Economics and in Psychology, 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51 (1995), pp.58-74。

是在**每一當下瞬間** - 也就是 Nassehi（2006）所說的當下發生著的時間（echte Zeit）[14] - 開啟了新的脈絡，作為控制當下的選擇之用（魯貴顯，2007）[15]。脈絡作為一個限制性框架，並不是限制著事件如何推進，或事件如何銜接，並因此讓人感知到所謂的時間流動，好似時間就是在一個框架中進行的運動。反而，敘事或閱讀進行之際，每一瞬間的理解就是完成一次溝通，也就是當下時間實現的一剎那，並總是指向其它可能的事件，因此，時間並不帶來行動鏈式的先後接續，它只負責**讓當下的事件實現之後隨即消失，並引發可能實現者到來**。也就在這些要隨後實現的諸可能性上，出現了複雜性與偶連性。時間為溝通（社會秩序）安排了不確定性。

以下我們會再詳細說明時間，在此只是指出，透過多重的脈絡來限制偶連性是不夠的，因為偶連性並非來自於世界中本質性的偏離。它是隨著溝通與時間而生的，就算是在後設的保險裝置那兒，它依然不會缺席。

2.2. 並列於空間的結構想像

亞理斯多德已經看到，故事有其一定的結構，它是超越故事中的主角及其角色特性。觀察者如亞理斯多德，已不再只是敘事者，而且還綜觀整個敘事，比較各種敘事之後，找出它們背後相關的原則。按照敘事結構，就真的可以再製造出類似的敘事效果？結構早在敘事之前就先行起著規定作用？當然，我們或許可以以語言來比擬，說話總是按照語言的規則，同樣地，敘事也按照某些潛藏的規則。但，結構規則畢竟不是語言本身，也不能製造語言，反而還是依賴著語言。結構的提問者的旨趣顯然不在於敘事，不在於引人入勝，而在於發明（而非發現！）結構。人們何時使用結構這個詞彙呢？在作者的新書簽名會上，談自己的作品時，重新發明一些

[14] 參閱 Armin Nassehi, Der Soziolog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a.M. 2006, S.390ff.

[15] 關於時間面向應獨立於空間化秩序之外的論點，請參閱魯貴顯，〈社會學中的社會變遷想像〉，《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卷 22，2007，頁 235-264。

框架原則，試圖將一幕幕原本不斷出現與流逝的事件化成可逆的，可高度預期的，可被模仿的作品分析。

Schütz 與 Shackle 兩人都指出，一般所談的時間倒述，或理性抉擇，或行動選項[16]，看似納入時間因素，顧及事物在時間之流中的變動，但其實已經將時間轉化成空間的並列。從 Schütz 的意識時間角度來說，並不能將時間中發生的選項看成是空間上的並列，因為這些所謂同時呈現的選項必須不斷進行時間的運作（即意識流不斷地起滅），並經由一再往上昇高的意識綜合層次，才能想像諸多共時並列的選項（Schutz,1967／盧嵐蘭譯，1991）[17]。因此，在閱讀時，讀者也常常在文本中使用這樣的綜合能力而使得情節固定下來，變成仿佛是在空間中延伸開來的事件先後之串連。這種高層次的綜合能力就像 Shackle（1979）所說的安排（arrangement）[18]，人的思想雖然只在當下起滅[19]（即 transient），但若對思想中的對象進行描述之後，就能將之轉化成可拆解與組合的諸多元素。如此一來，對象既可因為諸元素而一再被指涉，取得同一性，又可因為諸元素的增減及各種可能的組合而有所變異。思想中的對象或事件成為可在空間中供人環繞觀察，而時間反倒成了測度它們的變化過程時所需的工具。

此外，敘事中的事件由時間轉成空間化的趨勢，會因為溝通的「物質化」而更深刻。即，文字書寫使作者與讀者皆進入空間並列與佈置的想像之中。如 Ong（1980）所說的，書寫使事件的先後出現變成了共時出現[20]。

---

[16] 例如所謂的客觀可能性，參閱柯志明，同前揭書，頁 161。

[17] 參閱舒茲，《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盧嵐蘭譯，台北 1991，頁 75 及之後。

[18] 參閱 G. L. S. Shackle，Imagination, Formalism, and Choice，in Mario J. Rizzo (ed.), Time, Uncertainty, and Disequilibrium: Exploration of Austrian Themes，Mass.：Lexington Books，1979，pp.19-31。

[19] 因此對 Shackle 來說，知識也只能當下的知識，而非可累積的知識。事物的所是，同樣是依賴於當下，而非本體論的存在。

[20] 參閱 Walter Ong, Reading, Technology, and the Nature of Man: An Interpretation, in: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10 (1980), p.132-149。

而且，也正是書寫文字使得對象得以被想像成恆定存在的，文字符號變成了關於「某物」的能指。所以，在閱讀時，被敘事的故事就呈現（或得以被想像）為一種真實存在的「在那兒」，而讀者可藉此要求自己去「發現」故事的來龍去脈，或者，將「在那兒」的故事當成一種限制（即文本），而要求自己進行各種可能的詮釋。

社會學對於行動或是敘事活動的理解，包括社會學自身生產的敘事，大多依靠著上述的限制（Beschränkung），排除諸多不確定性。因此，面對敘事活動時，社會學往往假設著，人具有說或聽故事的人類學能力，或者，敘事背後必然傳達特定的文化意涵，或者，欲辨識敘事的（不）真實性，或，歸納敘事的類型。這麼一來，時間在敘事這個問題上就輕易地被化約為事件的銜接序列，或是事件之間的變化。

以下我們將敘事視為一種溝通形式，並且假設，面對著其它的形式，如組織、功能系統、媒體等，它必須以重重的溝通佈置使自己成為可以被辨識的溝通選項。

3. 敘事作為溝通形式

3.1. 未必出現的敘事

若將敘事視為一種極不可能的溝通形式，那麼，社會必須添加什麼樣的條件，使之更易於出現呢？首先，（建構出）聽者在場，或者，聽者必須被想像是在場的[21]，而且聽者的敘述機會是被抑制住的。這可以藉助於像是麥克風、訪談者手上的問卷紙、一份報紙雜誌、面試時的桌椅排列方式，或是聽證會議等等。這些設備或空間佈置都是某種後設溝通，或者可以說是 Paratext[22]：互動中只有一方可以敘述。此時，溝通接續的壓力轉到了說者身上，他必須為自己安排更強的動機，使敘述不致中斷。而聽者也必須時時給予訊號（例如傾聽時的臉部表情），提醒對方，他仍然抑制著敘述的

[21] 像是魯賓遜漂流記中，主人翁面對著自己，陳述著關於自己的行為以及對自己的評價。

[22] 參閱 Dirk Baecker, Hilfe, ich bin ein Text, in ders. Wozu Soziologie? Berlin 2004, S.31-42。

機會。這一切都是在溝通著一件事，即，敘述必須出現而且持續下去。這也是敘事溝通中的關連問題（Nassehi＆ Saake, 2002）[23]。

在閱讀情況下，說者與聽者並非同時在場。作者只留下書寫文字，而聽者隨時可以拋開書寫文本，離開敘事的溝通。所以，敘事溝通在閱讀時就更難出現了。例如，書本可能只被當作空間的擺設工具，作為象徵符號，或者，當作資料收集的對象。要解決這個難題，敘事只能依靠：書寫文字「或許」會被閱讀。因為，書寫文字可以被當作文本，而使人推想，存在著一個敘述者，將原本要講述的東西轉變成文字而被記錄下來。所以，書寫文本本身，在溝通上，已要求人們（即便還未成為讀者）假設敘述者始終存在著（因為文本始終存在著）。為此，人們甚至在書本上印出作者名稱，及其個人生平簡介，或是約略介紹故事情節；將文本體裁歸類為小說、傳記；列出「受訪者」、「親身經歷的人」等等。如此一來，讀者才有可能將自己視為讀者，閱讀著一個彷彿由敘述者道出的故事。

3.2. 時間與虛構空間

若敘事真能出現，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敘事溝通如何運作著？這應該不是靠著說者與聽者的想像力，或社會化的效果，或文化的特殊性，或語言文法結構等等。我們試著回到溝通所依賴的幾個最基本運作方式，以此觀察敘事的實在是如何構成的。

根據 G. Spencer Brown 所指示的運算方式，任何一個有限的式子表達只能有一個解。但是當式子多次計算自己時，就會出現無可決定性（indeterminacy），具有兩個皆為有效的解。將此道理應用在社會系統上便是：當一個溝通系統進行自我觀察時，雖能得出一個關於自己的想像，但

---

[23] Nassehi 與 Irmhild 對生平研究（Biographieforschung）進行二階觀察時指出，訪談的互動中，受訪者在敘述其生平時是受制於當時的溝通，必須不斷地在當下製造出可敘述的故事，而訪問者必須設法從中尋找偏離的，少被聽聞的事蹟，並要求受訪者擴大此類經驗。參閱 Armin Nassehi / Irmhild Saake, Kontingenz: Methodisch verhindert oder beobachtet? Ein Beitrag zur Mehtodologie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Jg.31, Heft 1, 2002, S.66-86 (71ff.)。

本身其實已變得更為複雜，外界或它自己皆無法對之預測。欲表達這種無可決定性，即兩值同時均可，Spencer Brown 建議使用擺盪（Oszillation）：當一個值出現時，就要讓另一個值出現，同時使自己消失，反之亦然（見下圖）[24]。

圖中，p 所處的位置就是擺盪於兩值，它無法穩定地座落於某一值，或空間中的某個點，因此被稱為「想像狀態」（imaginary state）。對社會系統來說，這是指，系統必須不斷來回處理各種可能互異的、矛盾的溝通，好似它既存在於此溝通，又同時存在於另一溝通之中。系統在這樣一個想像狀態中為自己建構起界限，以便跨越。也由此，系統有能力建構一個「之外」，有待系統跨越界限並對之規定。溝通在此取向於未來，有待規定的未來。界限製造了跨越的意圖，也引發對不可知的想像[25]。溝通雖然走向不確定之途，但卻提高了銜接的可能性。

Spencer Brown 繼續探究這個無可決定的式子，並得出另一個看法：式子在某一時刻的值，取決於上一時刻的某值。反過來說，只要知道此一刻的值，就可以推出下一刻的結果。此時所關乎的不再是無法決定，式子究竟是哪個值，而是關乎：在無限自我運算的式子中某一時刻的值與下一時

[24] 更詳細的說明，可參閱魯貴顯，〈功能分化社會中的偶連性與時間. 一個系統理論的觀點〉，收錄於黃瑞祺編，《現代性．後現代性．全球化》，台北 2003，左岸出版社，頁 248-276。

[25] 藉著跨越，系統為自己創造了不確定性與未來的可能性。以 Castorriadis 的話來說，存有者本身在其所發生的形式之中經歷著他性（otherness）、變化，而創造出時間。參閱 Cornelius Castorriadis, Time and Creation, in John Bender / David E. Wellbery, 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Standford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8-64。

刻的值可以有明確的先後關係。Spencer Brown 稱之為記憶（memory）。一個社會系統會擺向何值，何時擺盪，是無可得知的，但是，一旦系統確定某個溝通的同一性，並由此得出下一個溝通的同一性（反之亦然）時，系統就將自身化約成諸多明確的溝通的關連。靠著記憶，即沿著溝通事件往前往後挪移，系統開始能假想世界如同鏈條一般，諸多行動事件並列於空間，相互串連[26]。藉此，人們才能想像一個相對穩定的，可規定的行動事件的空間。行動事件總在銜接之前就已經被記憶規定了。

敘事作為溝通形式也同樣使用著擺盪與記憶這兩個運作模式，以便一方面製造出一條有待跨越的界限，另一方面則製造一個彷彿散佈著（某種程度上已被連結起來的）諸行動的空間。換句話說，當敘事中的觀察能望見另一個彷彿在外的區別或溝通，並對之跨越時，時間就出現了；同時，這個跨越總是往某個方向，使敘事中的溝通與另一個溝通相銜接。現象學的見解也離此不遠，Heidegger（1979／王慶節、陳嘉映譯，1990）認為，此在（Dasein）中早已發生的掛念安排著時間，使人們處於某種當下，並能望見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即所謂的 reckoning with time），或回首過去[27]。這種在此在所產生的時間是先於任何對時間的描述，例如可測度的時間或直線的時間。Ricoeur 依此而宣稱，敘事必然是在時間之內發生著（within-time-ness）：敘事中的人物必然因某種掛念而行動著，他身處某種此在的當下，能投射出特定的未來與過去，而且，他更能詮釋時間為何，就如同敘事者以故事表現出他自己對於週遭世界的時間理解（Ricoeur, 1980）[28]。敘事者或敘事中的人物，在當下所詮釋的時間（過去、現在與

---

[26] van Fraassen 便是將時間視為一種邏輯空間。當人們閱讀時可以將時間當成製造秩序的工具。每位閱讀者都可以在各自的時間中創造出對世界的不同描述。參閱 Bastiaan C. van Fraassen, 前揭書。

[27] 參閱馬丁.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王慶節、陳嘉映譯，台北 1990：桂冠，頁 533f。當人們以周遭手邊事物經驗時間之時，時間便轉化成可被測量的事物。

[28] 參閱 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in W.J.T. Mitchell, On Narrative, Chicago and London 1980: Thi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65-186。再者，也因此 Ricoeur 會提醒，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時間，一是敘事者敘事時的時間，另一是敘事內容中的時間。

未來）正是遵循著 Spencer Brown 所說的記憶機制。

3.3. 說者與聽者：銜接問題及偶連性問題[29]。

無論是雙方在場的互動，或是靠著文本而假設的敘述者與閱讀者，上述這些週邊性條件，也就是使敘事溝通更易出現的設置，指出一件事：**有人敘述著**。由此，溝通被要求去觀察（被建構出來的）敘述者，而且是觀察這位敘述者如何地敘述。擺盪出現在敘事溝通的兩端，說者與聽者。在聽者這邊出現了詮釋的自由與偶連性。說者在敘事時假設著聽者會有其它的銜接可能，或者，說者也可以使自己進入聽者的角色，以便挖掘這些可能性。而聽者也在此假設，說者已經完全知道事件的全貌，但又以似乎事件正在發生，結局無從斷定的樣子敘述著[30]，因此，聽者同時面臨著已規定的與不確定的溝通。再者，聽者也因為被說者假設具有詮釋的自由，而能不斷想像一種偏離敘事內容的經驗，製造出驚訝。雙方在敘事溝通中都獲得了自由：說者有規定敘事銜接的自由，聽者有觀察及體驗偏離的自由[31]。由此也可以清楚知道，敘事絕非反映客觀發生的事件，而是製造銜接的偶連性與不穩定性[32]。

敘事溝通使用此組差異，而且是兩面的差異，並將其它的第三者排除在外。這也表示，不會再另立一個仲介者或客觀評論者。只要觸及敘事，就必須承擔起說者與聽者的角色。因此，關於小說、田野訪談、故事或神話採集等等的社會學研究者也必須納入到這裡所說的二階觀察的遞迴圈。

---

[29] 這裡所談的說者與聽者毋須等同於行動者，他們只是溝通用來聚集及控制偶連性的兩個端點。也許可以將他們想像成諸多差異所構成的人工物。

[30] 因此，敘事的一個時間特性，開始與結束，就從時間面向轉到社會面向。聽者不必一定要假設故事的起始與結束，反而也可以假設說者必然知道故事的起始與結束。

[31] 而且，也正因為有了這種被創造出來的自由，人們才能談到共識或理解。

[32] 雖然 Soulsby 看到了敘事中呈現的秩序與混亂成份，但還是不夠徹底。她只強調敘事會隨著意義組織的嚴格程度，而使讀者感到取向明確，或是迷失空虛。參閱 Marlene P. Soulsby, Order and Disorder: Creating Temporality in Literary Experience, in: J. T. Fraser: Time and Process: The Study of Time VII,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92, pp.205-216。

研究者在觀察敘事內容，或者在重述故事，或者觀察聽者如何理解故事時，看似立於說者與聽者的差異之外，但其實仍舊擺盪於這差異的兩面之間。例如，研究者如 L. Goldmann 的小說社會學[33]，雖然為小說作者與讀者設立了社會存有的限制，各階段資本主義的特性反映在小說裡的人物特性與故事情節，但是，從這裡所建議的理論來看，Goldmann 正是站在聽者的位置，而擁有偏離與詮釋的自由，對（小說的）說者進行觀察：既觀察小說的故事內容、人物、情節，又觀察制約著說者寫作的背後（不可見）力量。簡言之，對敘事進行觀察的觀察者總已經處在敘事溝通之中。

3.4. 以二階觀察保證事件的實在（事物面向）

敘事並不是空洞的溝通，它總是關於某些發生的事的溝通。但是這些某些事是如何地存在著呢？為何敘述者能說某些事呢？聽者如何能知道他所聽的就是說者所說的呢？這是依靠著所謂的共識、共同文化、脈絡嗎？

首先，敘事作為一種溝通形式，同時也納入一些非敘事的形式，並對之加以規定（例如科學報告、數學計算、藝術展演、組織檔案、心理治療的對話等等溝通形式）。因此，敘事是與這些形式共存著，並同時試圖將之排除在外[34]。敘述時，溝通必定會指涉這些形式。溝通可以進到這些形式之中，而捨棄敘事的形式，或者，溝通可以將這些形式改寫進來，安排成敘事的內容。人們必須一直嘗試著**觀察**敘事形式與其它形式的不同，並維持著這個區別，但不一定總是能夠成功。閱讀時，讀者同樣地有自由跨進或跨出敘事形式，或是跟隨著敘述者，或是以真理、權力、決斷等功能系統的區別進行溝通。這樣的觀察若要提高敘事形式的可能性，就必須靠著前面所提的「有人敘述著」這個溝通前提，並由此進行自我觀察與描述，尤其是**觀察著，敘述者如何地觀察著敘事這一件事**。一旦溝通繼續維持在

---

[33] 參閱伊凡絲，《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廖仁義譯，台北 1990：桂冠，頁 97 之後。

[34] 例如 Lyotard 試圖瓦解敘事與科學語言之間的界限。這並沒有成功地指出科學語言最終仍是依賴著敘事，反而只是證明了敘事也需要對立的諸形式，以使得敘事溝通持續下去。參閱弗朗索瓦・利奧塔，《後現代狀況. 關於知識的報告》，湖南 1996, 湖南美術出版社。

敘事形式中，即不斷憶起說者在敘述著，事件就能成為客觀發生的事件。對敘事的觀察保證了被敘述的事件的實在。

以二階觀察保證故事實在的作法，對 Geertz 來說並不陌生。他認為，文化人類學的描述在於透過自身的觀察工具，特別是書寫文字，重構研究對象的意義網絡。而為了達到深層的重構（Geertz 稱之為 thick description），研究者或敘述者必須能融入深度的遊戲或文化活動之中，進而編織出一幅完整的意義圖案（Geertz, 1973／納日碧力戈譯，1999）[35]。研究者不再只是重覆他先前的聽聞，他必須設法融入遊戲，如當地人般地行動，以取得觀察的可能性，編織出故事。更重要的是，不只是研究者進行意義重構的工作，甚至被觀察的遊戲者，即被研究的對象，也同樣學習著如何編織意義之網，學習如何描述自己。所以，人類學所敘述的故事是關於當地人以自己的觀察工具所重構出來的故事。敘述者（研究者）並未直接面對事件本身，而是依賴著當地人的敘事，只有觀察別人在敘事時所進行的觀察時，才確保自己本身的敘事的實在。

其次，從內容的角度來說，敘事形式中有諸多的差異起滅並銜接著。不過，這並非意指，所有這些差異構成了故事、情節，因為這樣的看法就陷入了之前所說的空間並列的想像。這裡的關鍵應是，一個（不太可能出現的）差異會為讀者（包含不時將自己想像為讀者的敘述者）標示一邊，並同時使另一邊保持為**不確定**。這時，讀者或聽者（觀察者）處在一個由此差異所展開的世界，他也在這個世界中觀察這個既予的差異，觀察界限何指，觀察跨越之後的結果。他也觀察另一邊的不確定性，激發出**跨越**的企圖。

聽者或讀者可以跨越到另一邊，做出規定之後，再返回已被標示的一邊，並因此改變了這一邊的內容。這種跨越界限的往返可以使得原本不確

[35] 參閱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譯，上海 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另外關於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彼此觀察對方的觀察，參閱 Dean MacCannell / Juliet Flower MacCannell, The Time of The Sign.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ulture, Bloomington 1982, p.68ff.。

定的一面變得確定，同時也使得原本確定的一面變成偶連的。在敘事中，這是指，不論是敘述或者閱聽，都不斷地藉由差異而製造出未被規定的情節、人物、條件、地點等等，並引出跨越界限的興趣。每次對未規定狀態這一面的規定又更動了先前所確定的同一性，即，已被指認的事件隨時間而有所變化。敘事不在於書寫出來的文字，也不在於被預設的文本，它是作為溝通，在每剎那以擺盪或回憶進行著短暫的理解，並隨即往下銜接，而且始終是環繞著對於敘述者的觀察。

3.5. 自由、偏離與跨越

一個故事不是依靠著事先發生過的事件，也不是因為它按照特定的結構進行，更不是來自於一些行動的組合。在跟隨著一個區別出現時，溝通依靠著「有人敘述著」這個前提，要求人們去觀察，敘述者接下來會說出什麼？或，去觀察，敘述者如何觀察別人對他的敘事的期待？按照這樣的二階觀察，觀察者不再安於（被建構出來的）「敘述者」所指出的方向、先後順序，而總能為自己製造出**偏離**（Abweichung），並可能繼續強化此偏離。因此，溝通會開始流向未知的諸區別，並不斷回頭使它們有（新）意義地銜接起來（稱之為情節、人物角色等等）。故事就在諸區別之間展開，既劃定界限，又往外跨越。或許我們可以說，敘事就像遊戲一般，二階觀察者緊緊扣住「有人敘述著」這個前提下所想像的故事本身，而在每次的溝通中可以嘗試不同的區別。因此 Heise 能觀察到，現代主義小說已放棄時間的先後（因果關連）序列，轉而致力於呈現諸多詮釋觀點共時存在（simultaneity）。甚至，後現代小說作家觀察著讀者的閱讀期待，試圖打亂事件的時序，製造矛盾、不連貫的情節，或者，使故事進入不可預測的未來，以未來可能的時間經驗投射回當下，進而使過去不再起決定作用（Heise, 1997）[36]。讀者則試圖辨明，作家本身是否耽擱於多層次的故事之中，難以自拔。或者，讀者被要求從奇特的印刷與排版方式，重新為自己拼奏湊

[36] 參閱 Heise, Ursula K.: Chronoschisms. Time, Narrative,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et al.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2ff.。

出（不）連續的意義想像。

敘事如小說、報導、見證報告、回憶錄、訪談記錄等等，甚至口語敘述，對社會而言是具有**實驗性質**的觀察。所謂的實驗性質，是指溝通取向於對未來的想像，或者，偏離當下社會的現狀，或者，發掘潛在的、邊緣的事態，旨在與所謂的常態生活相對比。無論如何，藉著觀察「有人敘述著」一事，聽者與說者為自己製造多個敘述者與敘述角度，並使自己於其中來回跨越。他們除了知道各個視角下的社會想像之外，還（後設地）知道，對於社會的觀察只取決於，**繼續找出敘述者**，使得社會將自己想像為「**有待說出（傾聽）**」或「**尚未說出（尚未被傾聽）**」，以創造出更多樣的，可偏離期待的敘事內容。這正是敘事的功能所在。

在科學系統中，「被想像者/ 真實者」這個區別的兩邊多次再進入對方之後（Luhmann, 2008）[37]，即，兩邊多次相互運算之後，敘事一方面似乎被排除在科學之外，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學接觸外界時不可或缺的材料。在敘事中，研究者感受到進入對象的自由，也能由此描述，科學排除了什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敘事與論證、理論、法則彼此交錯著：一則故事、報導或記錄可以套上科學論文的格式，讓說者與聽者既可能意識到虛構的世界，又可能轉而接受其中的命題為真。科學論文之中可以放入一段訪談稿，讓科學變成彷彿一個失真的描述者，但卻又宣稱自己的命題是屬於真理；或者，科學將訪談稿中的敘述視為虛構的，只是對另一個本真的文本的再現。或是，敘述者試圖讓自己出現在文本或在敘事的內容之中，說明自己所參與的經歷或是所使用的觀察方式，藉此保證文本所敘述的是真實。或者，文學理論試圖討論小說中的科學邏輯的比重。或者，在社會學的論文中呈現出敘事的過程，或，又再後設地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討論，社會學的研究作為敘事，如何地重覆著所有敘事的行動結構。或者，經過反省的科學試圖以淺顯的敘述方式代替科學的論證與符號。

---

[37] 參閱 N. Luhmann, Literatur als fiktionale Realität, in: Schriften zu Kunst und Literatur, F. a. M., 2008, S.276-291。

人們一直從二階的角度觀察著敘述者，在二階觀察上編織著一階觀察中的對象（即故事中的事件）。雖然每次講述故事時，內容總有變異，說與聽的人在各自的敘事世界裡跨越著，他們之間沒有所謂的共識，也沒有傳達與接受的關係，但是靠著假設「必然有敘述者觀察著故事」一事，促使說與聽雙方假想界限，並對之跨越，這麼一來，故事便能被想像是有秩序的。

4. 代結語

本文嘗試從 Luhmann 的系統理論出發，解構社會學的行動概念及其背後的實踐效果，並論證行動的實在來自三段式的區別。此溝通概念將敘事當成不太可能出現的社會形式，除非溝通能準備更多的條件使敘事一事變得更易於辨認，進而假設述說者必然存在著。說者與聽者，在社會面向上被建構出來的區別，是敘事時被持續觀察的對象，既可使人融入任一角色，又可立於旁觀者角色，操控敘事與專業溝通之間的組合方式。但，敘事作為溝通，即不斷起滅的事件，其實在並不取決於所謂客觀發生的事件或見證者，也不在於故事的邏輯與合理性，而是界限的跨越與回憶。此二機制得自於 George Spencer Brown 的形式理論。回憶可以為敘事製造穩定期待，跨越則使敘事為自己製造一可達及的外在世界，並製造出對之描述與回應的意圖。

就像知識社會學將科學實驗室當作田野，揭露自身如何被建構為知識，上述所言的敘事運作方式也可用於反思社會學的研究，觀看自己如何在訪談、田野資料、論文中製造多重的行動者，並來回穿梭於這些身份之間，進行多重角度的觀察。相對地，社會學的溝通概念揭露了，敘事作為諸多溝通形式之一，是不必然出現的。在現代社會中，面對著功能系統所提供的高效能溝通形式（權力、貨幣、真理等等），敘事必須為自身佈置更多的週邊條件，以保證聽與說的情境更可能被辨識出來。每個敘事活動就是創造行動者的實在，並讓人想像這位行動者將出現在科學、教育、法律、藝術等等領域，也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參考文獻

王文融譯（2003）。《虛構敘事中時間的塑形：時間與敘事卷二》。北京：三聯書店。（原書 Ricoeur, P.〔1984〕. *Du temps dans le recit de fiction : temps et recit tome Ⅱ*. Paris : Ed. du Seui）

王慶節、陳嘉映譯（1990）。《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原書 Heidegger, M.〔1979〕.*Sein und Zeit* . Tubingen : Max Niemeyer Verlag）

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2006）。《詩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柯志明（2005）。〈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學》，10：149-170。

島子譯（1996）。《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原書 Lyotard, J. 〔1979〕.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 rapport sur le savoir*. Paris : Éditions de Minuit）

納日碧力戈譯（1999）。《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Geertz, C. 〔1973〕.*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 Basic Bookss）

張明德、夏翼男與彭剛譯（2003）。《社會行動的結構》。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Parson, T.〔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章明儀譯（2003）。《心智與自然 ： 統合生命與非生命世界的心智生態學》。台北：商周。（原書 Bateson, G.〔1988〕. *Mind and nature : a necessary unity*. New York : Bantam.）

廖仁義譯（1996）。《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原書 Evans, M.〔1981〕. *Lucien Goldmann : An introduction* . Brighton, Sussex : Harvester Press.）

魯貴顯（2003）。〈功能分化社會中的偶連性與時間：一個系統理論的觀點〉，黃瑞祺（編），《現代性・後現代性・全球化》，頁 248-276。台北：左岸出版社。

魯貴顯（2007）。〈社會學中的社會變遷想像〉，《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2：235-264。

盧嵐蘭譯（1991）。《社會世界的現象學》。台北：久大。（原書 Schutz, A.〔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Castorriadis, C. (1991). Time and creation. In J. Bender & D. E. Wellbery(Eds.), *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pp. 3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ás, S. (1996). What's wrong with representation. In G. M. Gugelberger (Ed.),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pp. 161-171).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ecker, D.(2004). *Wozu Soziologie?* Berlin: Kadmos.

Elias, N. (1998). *Ü ber die Zeit. Arbeiten zur WissenssoziologieI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anFraassen, B. C. (1991). Time in physical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J. Bender & D. E. Wellbery(Eds.), *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 (1991). The time of telling and the telling of time in written and oral cultures. In J. Bender & D.Wellerby (Eds.), *Chronotypes: The costruction of time*(pp. 77-9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se, U. (1997). *Chronoschisms: Time, narrative,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 (1984).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Luhmann, N. (2008). Literatur als fiktionale realität. In N. Werber(Ed.), *Schriften zu Kunst und Literatur*(pp. 276-29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MacCannell, D., & MacCannell, J. F.(1982). *The time of the sign: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Nassehi, A. (2006). *Der Soziolog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Nassehi, A. & Saake, I. (2002). Kontingenz: Methodisch verhindert oder beobachtet? Ein Beitrag zur mehtodologie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31, (1), 66-86 .

Ong, W. (1980). Reading, technology, and the nature of man: An interpretation.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10,132-149.

Quattrone, P. (2006). Case study as lacuna: The presence of an abse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estimony. *Organization*, 13(1), 143-157.

Ricoeur, P. (1980). Narrative Time. In W. J. 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pp. 165-18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ntos, M. S. (2001). Memory and narrative in social the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Jacques Derrida and Walter Benjamin. *Time and Society*, 10, 163-189.

Shackle , G. L. S.(1979). Imagination, formalism, and Choice. In M. J. Rizzo (Ed.), *Time, uncertainty, and disequilibrium: Exploration of Austrian themes.* Mass.: Lexington Books.

Shannon, C. & Weaver, W. (1949).*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oulsby, M. P. (1992). Order and disorder: Creating temporality in literary experience. In J. T. Fraser(Ed.), *Time and process: The study of time VII*(pp. 205-216).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White, H. C. (1995). Social networks can resolve actor paradoxes in economics and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1, 58-74.

Narrative as Oscillating Between Time and Imaginary Space: An Systems Theory's Approach

Lu Kuei-Hsien

Abstract

Generally time is reduced as sequence chains to produce a social order. Accordingly sociology 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actor which includes acting conditions, intention and cognition. Even in narrative or story telling this assumption of time works well. The narrative's reality but is not founded on what real happened, neither on plot nor being familiar to reader.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which bases on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and George Spencer Brown's form theory,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time, especially presence of telling and listing.

Narrative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in which every event happens in a moment and disappears immediately. It constitutes social dimension, namely the distinction teller/listener and creates a communicative space with two different states, specified and unspecified. According to Spencer Brown, time and memory should be two mechanisms that give one the possibility not only to cross boundaries also to create a stable expectation. Narrative's reality therefore depends on the imaginary communicative space.